

唐宋时期三佛图像类型分析*

——以四川、陕北石窟三佛组合雕刻为中心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ree Buddha Images in the Tang-Song Period Based Largely on Examples from Buddhist Triads in Grottoes in Sichuan and Northern Shaanxi

李静杰

Li Jingjie

内容提要：

本文以实地调查四川、陕北唐宋时期石窟中三佛图像为中心，兼采用其他相关图像，通过对资料的全盘梳理，划分出若干三佛组合类型。主流的三佛图像为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或药师佛中三者组合，其中前三者组合占半数以上。三佛图像在南北朝晚期以来弥勒佛、阿弥陀佛信仰基础上产生，于唐宋时期净土信仰风行的环境中获得较大发展，反映了人们向往并祈求往生净土世界的心态。此外，还存在少量唐代对称构图的不明确三佛图像、辽宋时期与华严经思想关联的三佛图像，以及金代纵向三世佛图像。

关键词：

四川石窟 陕北石窟 唐宋时期 三佛图像 净土信仰

ABSTRACT:

The author focuses on examining Buddhist triad sculptures in Buddhist grottoes in Sichuan and northern Shaanxi and sorts through this material in light of documentary information to evolve a typology of this artistic form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The usual triad comprises groups of three figures centered on the Sakyamuni, Maitreya, Amitabha or Bhaisajyaguru Buddhas, and of extant triads more than half are centered on the first three of these figures. From the lat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onwards, belief in Maitreya and Amitabha resul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ree Buddha groups featuring these two Buddhas, and in the Tang Song period the environment of Pureland belief greatly developed, reflecting a psychology desirous of the Pureland worl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eities in many of the triads in the Tang Dynasty's symmetrical compositions are unclear, while those of the Liao Song period are often triads associated with the Huayan Sutra and those of the Jin Dynasty with the Buddha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KEY WORDS:

Sichuan Buddhist grottoes; northern Shaanxi Buddhist grottoes; Tang Song period; Buddhist triads; Pureland beliefs.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6 年度一般项目“南北朝隋唐宋佛教美术的图像与思想”（批准文号 06JA730003）的部分内容。

在四川¹、陕北唐宋时期摩崖龕像及石窟中，存在大量三佛组合或以三佛为主尊的图像构成情况。其三佛绝大多数为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或药师佛中三者组合，其中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为主要流行形式。此外，尚有少数与华严经毗卢遮那佛结合形成的净土类三佛及三身佛，它反映了在净土信仰热情高涨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奢望中多样而又模糊的净土观念。三佛图像有别于以往人们所认知的同时期流行的西方净土经变、弥勒下生经变，又能够反映当社会的主流信仰形态。迄今为止，此类重要图像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三佛图像的实质内涵还没有发掘出来，相关研究者将三佛随意定性现象亦十分普遍。有鉴于此，本稿以多年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²，参考学界披露的相关信息，在尽可能客观分类的前提下，力求厘清唐宋时期三佛图像的发展脉络，揭示其中蕴藏的文化心理内涵。

本考察以四川、陕北实例为主体，还涉及同时期河南、山东、山西、辽宁、甘肃、广东等地零星散布的实例。题记、姿势与手印是判断诸实例，即各个具体组合中某一佛像属性的基本依据。各个实例中佛像

手臂多有残缺现象，而实地观察残存痕迹可以大体判别所施手印。继而，参照那些属性明确的相同造型实例，比定诸三佛组合中各尊像的属性。尔后，在梳理已掌握全部实例的前提下，辨别出各种三佛组合的类型，逐一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佛教义理和信仰意识。进而阐述对三佛图像发展规律及其反映信仰形态的认识。

一 释迦佛 + 弥勒佛 + 阿弥陀佛
组合的三佛图像

释迦佛、弥勒佛与阿弥陀佛组合，约占笔者统计三佛图像总量的 3/5，为唐宋时期盛行的三佛组合形式，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具体而言，唐代主要流行于四川，根据阿弥陀佛手印的差异，可以细分成两种情况。宋代主要流行于陕北，依据与其他图像组合的不同，亦细分作两种情况。

（一）唐代释迦佛 + 弥勒佛 + 阿弥陀佛组合(1)

该组实例以施转法轮印阿弥陀佛为界定对象，已知八例，具体如表一。

[表一] 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的三佛图像之一

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			其他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造像龕	西龕：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两手残缺)	北龕：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两手修补)	东龕：倚坐施无畏印(两手修补)	东龕配置五十菩萨
②临猗半坡寺武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造像碑	结跏趺坐施触地印	倚坐施无畏印(右手残缺)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右手残缺)	涅槃经变

1 此指 1997 年重庆被划分为独立行政区之前的四川地域。

2 参加历次调查的还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研究生廖苾雅、

谷东方、陈红帅、李静、范丽娜、林志镐，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林保尧及助手李冠畿、徐逸鸿，以及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颜娟英、林圣智。

(续表一)

③丹棱郑山盛唐第1龕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右手残缺)	倚坐施无畏印(右手残缺)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	
④丹棱郑山盛唐第9龕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	
⑤丹棱郑山盛唐第74龕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两手残缺)	倚坐施无畏印(右手残缺)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右手残缺)	
⑥苍溪阳岳寺盛唐第4龕	倚坐(两手残缺)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右手残缺)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两手残缺)	药师佛、地藏菩萨

据表一,实例集中在初盛唐时期,其中实例①〔图一〕¹、⑥²分布在川北,实例③〔图二〕³、④〔图三〕⁴、⑤〔图四〕⁵分布在成都周围,实例②〔图五〕⁶在晋西南。实例呈现由川北向川中发展迹象,又反映了与中原的联系。

在尊像造型方面,从表一可以看出,各个实例的组合中包含三种尊像,即结跏趺坐施无畏印(或触地印、禅定印)佛像、倚坐施无畏印佛像、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佛像。以下,从后两者开始分析。

北魏中晚期,倚坐已经应用于弥勒佛造型⁷,而当时还不是弥勒佛的专用造型形式。北朝末期至隋代,弥勒菩萨与弥勒佛比较普遍地采用倚坐姿势,尤其在隋代,倚坐逐渐发展成弥勒佛的专用造型形式。入唐以后直至宋代,弥勒佛造型几乎采用这种姿势,虽然唐代作为释迦佛表现的优填王像,亦为倚坐姿势,但这种特殊造型还连带着其他造型特征⁸。就唐宋时期大量普通造型的倚坐佛像而言,众多具佛名题记的实例,可以证实其弥勒佛属性⁹。这样看来,表

一所列倚坐佛像应视为弥勒造型。倚坐佛通常施无畏印,在中国这种手印多用于说法的表现,此即弥勒下生成佛说法。

北齐、隋代已出现少许施转法轮印佛像实例,其佛像多作释迦佛或弥勒佛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邯郸南响堂山第2窟中心柱正面龕上方阿弥陀净土经变,其中结跏趺坐阿弥陀佛手印,接近本稿所述转法轮印。而且,见有施转法轮印的传世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砖佛及西安出土唐初砖佛实例¹⁰。此二砖佛主尊坐在一根三茎的中央大莲蓬上,两侧小莲蓬上胁侍二立菩萨(其一提净水瓶),类同唐代流行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组合西方三圣图像。可见,北朝晚期至唐初,转法轮印造型已经发端于中原,并应用于阿弥陀佛。在川北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叶石窟中,一度流行一佛五十菩萨图像,主尊佛像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这种图像亦见于7世纪中叶洛阳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¹¹。川北地区的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造像龕,刊刻“阿弥陀佛并

1 仇昌仲:《梓潼卧龙山千佛崖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

2 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苍溪阳岳寺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苍溪县阳岳寺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4年第1期。

3 王熙祥:《丹棱郑山——刘咀大石包造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

4 前引《丹棱郑山——刘咀大石包造像》。

5 前引《丹棱郑山——刘咀大石包造像》。

6 山西省博物馆藏。李静杰:《造像碑的涅槃经变》,《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

7 李静杰:《雲岡第9·10窟の圖像構成について》,《佛教藝術》第

267号,2003年。

8 稻本泰生:《優填王像東傳考——中国初唐期を在中心に一》,《東方學報》第69册,京都,1997年。

9 值得注意的是,大足北山五代、北宋时期雕刻的药师佛经变中药师佛,亦采用倚坐姿势。而同一组合中还有十二神将等,可以判定药师佛属性的图像出现。

10 冈田健:《初唐期の転法輪印阿弥陀圖像についての研究》,《美術研究》第373号,2000年。

11 胡文和:《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的“西方净土变”》,《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李已生:《一佛五十菩萨和菩萨装佛》,《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雷玉华:《四川摩崖石刻中的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图一：1〕



〔图一：2〕



〔图一：3〕

〔图一：1、2、3〕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造像东面龕、北面龕与西面龕的局部



〔图一：4〕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造像西面龕



〔图二〕丹棱郑山盛唐第1龕



〔图三〕丹棱郑山盛唐第9龕



〔图四〕丹棱郑山盛唐第74龕



〔图五〕临猗半坡寺武周寺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造像碑 碑阴局部

五十二菩萨传”，通江千佛崖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第6龕题记“阿弥陀佛龕”¹，同种造型的成都龙泉驿千佛崖第37龕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造像，以及大足北山第52龕乾宁四年（公元897年）造像，题记亦作“阿弥陀佛”²。由此可见，该组像中的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主尊为阿弥陀佛造型，该造型及一佛并五十菩萨图像均来源于中原。四川以尊像形式表现的阿弥陀佛，强烈受到一佛并五十菩萨图像影响，往往采用施转法轮印造型³，甚至大足北山唐末第245龕观无量寿经变主尊，也是如此。因此，表一所列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佛像应视为阿弥陀造型。

基于以上论述，表一中剩余的结跏趺坐施无畏印（或触地印、禅定印）佛像，排除作为弥勒佛、阿弥陀佛表现的可能。就当时流行的佛像而言，只能考虑为释迦佛或药师佛，而后者如下所述，为托或捧药钵的特定造型。那么，只有判定为释迦佛才合乎情理。

自南北朝以来，施无畏印既为释迦佛造型通常采用的手印，而且，实例①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佛像龕外侧题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奉为亡妣亡口妆北面释迦牟尼佛”，在龕像开凿两个半世纪之后，妆修者依然认作释迦佛。释迦佛采用禅定印也不乏实例。触地印则是初唐以来受到印度菩提伽耶释迦成道像影响，普及开来的一种新手印⁴。表一中触地印应为适用于释迦佛的造型形式。

综上所述，表一所列6个实例，均形成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

在尊像配置（以石窟或龕像自身为基准确定左右，以下同）方面，表一中实例可以分作两种情况。实例①、⑥结跏趺坐佛像居中，其他实例倚坐佛像居中；实例②、③、④、⑤以倚坐佛像为中心，二结跏趺坐佛像配置两边，形成均衡视觉效果，显然出于对称构图的考虑。实例①三龕雕刻在一近方形巨石上，

1 陶鸣宽：《通江县的摩崖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2 前者实地调查。后者铭文见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出版社，1999年，页14。

3 中原情况大相径庭，如龙门石窟阿弥陀佛像，7世纪中叶多采用无畏印，7世纪末叶至8世纪初几乎采用触地印。久野美术：《唐代龙门

石窟的触地印阿弥陀像研究》，李振刚主编：《2004年龙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4 肥田路美：《唐代における佛陀伽耶金剛宝座真容像の流行について》，町田甲一先生古稀纪念会编：《论丛佛教美术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86年。又，肥田路美著、李静杰译：《唐代菩提伽耶金剛座真容像的流布》，《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

形成以北面释迦佛为中心，东面弥勒佛与西面阿弥陀佛对置的图像构成。作为未来佛的弥勒佛，就像东方初升的太阳，阿弥陀佛则象征亡者往生的世界，本在西方。可见，将二者东、西配置，与他们所代表弥勒下生净土和西方净土的方位一致。释迦佛为娑婆世界教主，亦是弥勒下生成佛经与阿弥陀经的说法者，处在中央十分合乎情理。因此，实例①基于各尊像属性按实际方位配置。实例⑥诸尊像既非对称构图，亦不与实际方位对应，配置呈现随意性。

在与其他图像组合方面，实例①西面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成一个组合，如题记所示，这是基于当时流行的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传说故事所表现的西域瑞像。事见唐道宣于麟德元年（公元 664 年）撰成《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卷中《隋释明宪五十菩萨像缘》（页 421 上）。初盛唐时期，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组合之雕刻及绘画流行中国，表明此瑞像作为西方净土的一个品种深入人心。实例①即

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造像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瑞像，以故事形式表现，却与以尊像形式表现的释迦佛、弥勒佛形成一个组合，反映了当时弥勒净土与西方净土共崇的现象。实例②即临猗半坡寺武周天授三年（公元 692 年）造像碑，三佛画面中倚坐弥勒佛居中，与其上方的涅槃经变组织在一起，一方面反映了传统的涅槃图像注重佛法传承思想在延续，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行的弥勒净土与西方净土信仰，对涅槃经变施加影响。实例⑥三佛两侧雕刻药师、地藏，富于新意，如下文所述，药师佛为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发十二大誓愿，地藏菩萨则宣称“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能出于两者发洪大誓愿，救度众生的缘故，使之成对配置。

（二）唐代释迦佛 + 弥勒佛 + 阿弥陀佛组合(2)

该组实例以阿弥陀佛施禅定印或弥陀定印为界定对象，已知 10 例，具体如表二。

[表二] 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的三佛图像之二

造像名称	三佛			备注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巴中南龛盛唐第 64 龛 (坐南面北)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后世改造
②成都龙泉驿元堡盛唐 佛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③洛阳龙门开元五年(公 元717年)第964龛	结跏趺坐施触地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触地印	
④丹棱郑山盛唐第75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⑤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一组 合(坐北面南)	倚坐施自然手印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结跏趺坐(手印不明)	三龛连建
⑥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二 组合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三龛连建
⑦邛崃天宫寺中晚唐第 51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禅定印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⑧潼南千佛崖大中七年(公 元853年)龛(坐东面西)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自然手印	
⑨安岳庵堂寺咸通年间 (公元860—874年)第7龛	不明	不明	不明	
⑩眉山法宝寺乾德六年 (公元924年或公元968年) 三佛龛(坐南面北)	结跏趺坐手印不明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倚坐施无畏印	观音菩萨、 势至菩萨， 后世改造

据表二,实例集中在盛唐至五代时期,其中实例②〔图六〕、④〔图七〕¹、⑤〔图八〕²、⑥〔图九〕³、⑦〔图十〕⁴、⑩〔图十一〕⁵分布在成都周围,实例①〔图十二〕⁶在川北,实例③⁷在洛阳,实例⑧〔图十三〕、⑨⁸分布在川东。实例遍及四川佛教美术的主要发展区域,成都周围为中心地区,洛阳实例的存在亦反映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与表一列述实例比较,不仅流行年代下移,而且发展到川东地区,引人注目。

在造型方面,观察表二,除去特殊的实例③和造型不明的实例⑨,各个实例的三佛图像大体可以分为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佛像、倚坐施无畏印(或禅定印、自然手印)佛像、结跏趺坐施禅定印(或弥陀定印)佛像三种。

如前所述,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佛像通常作为释迦佛表现,推测此组实例也是如此。就现存唐宋时期大量倚坐佛像实例观察,剔除小数造型特异或明确所指的其他尊格倚坐佛像之外,几乎为弥勒佛表现。其绝大多数施无畏印,也有施禅定印或两手放在膝上的自然手印。此组三佛图像中的倚坐佛像依然可以比定为弥勒佛。此组实例中出现诸多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佛像,与释迦佛、弥勒佛组合,基于当时流行的尊像崇拜情况,比定为阿弥陀佛较为合理。

至于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佛像,作为特殊形式禅定印,原为密教曼荼罗五方佛中西方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的特定造型,习惯称之为弥陀定印⁹。盛唐时期《大日经》与《金刚顶经》汉译以后,随着正纯密教思想传播与密教美术发



〔图六〕成都龙泉驿元堡盛唐佛龕



〔图七〕丹棱郑山盛唐第75龕

展,出现施弥陀定印无量寿佛。由此看来,施弥陀定印无量寿佛造型,在初唐佛教美术中不会存在,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目前已知最早纪年实例,见于扶风法门寺塔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地宫出土,银质鎏金宝函金界曼荼罗图像中无量寿佛(以下简称法门寺地宫银函无量寿佛像)¹⁰。施弥陀定印密教无量寿佛造型,又影响到密教以

1 前引《丹棱郑山——刘咀大石包造像》。

2 前引《丹棱郑山——刘咀大石包造像》。

3 前引《丹棱郑山——刘咀大石包造像》。

4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邛崃天宫寺摩崖石刻调查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页4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龛外题记:“以乾德六年五月六日,设斋忏遇托,永镇山院供养。”此乾德六年为五代·前蜀乾德六年(公元924年),还是北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无法确知。

6 巴中市文管所、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巴中石窟》,页28~30,巴蜀书社,2003年。

7 刘景龙、杨超杰:《龙门石窟总录》第6卷《文字著录》页3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 前引:《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页215。

9 已发现印度帕拉朝金界五佛中无量寿佛,均两手在小腹前的腿上,施上下相叠禅定印(如肥塚隆 官治昭编《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第14卷 インド(2)》插图56、57,小学馆,1999年)。因此,怀疑弥陀定印并非来自印度,而创始于中国。

10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文物出版社编:《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0 佛门秘宝大唐遗珍——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图版17,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图八：1〕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一组合全景



〔图八：2〕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一组合右龕



〔图八：3〕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一组合中龕



〔图八：4〕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一组合左龕



〔图九：1〕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二组合全景



〔图九：2〕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二组合右龕



〔图九：3〕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二组合中龕



〔图九：4〕丹棱刘嘴盛中唐第二组合左龕



〔图十〕邛崃天宫寺中晚唐第 51 龕



〔图十一〕眉山法宝寺乾德六年（公元 924 或 968 年）三佛龕



〔图十二〕巴中南龕盛唐第 64 龕



〔图十三〕潼南千佛崖大中七年（公元 853 年）龕

外的西方净土类阿弥陀佛造像，实例⑥、⑧应即此背景中产物。不过，唐代弥陀定印均两手拇指指端与竖起的食指指端相合，不同于下述宋代实例。

实例③洛阳龙门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第 964 龕题记：“唐朝议郎行少府监主簿上柱国钜鹿魏牧谦龕像铭并序。尝读佛经云，过去、未来、见在为三世佛，欲求解脱而不归依者，未之有也……敬为亡考妣造阿弥陀像、释迦牟尼像、弥勒像合为三铺，同在一龕……”¹。由题记可知，此龕三佛图像中的二身结跏趺坐施触地印佛像，

分别为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

该组若干实例的题记，为分析三佛的属性提供了重要帮助。上述实例③还提供另外一个信息，即施主在概念中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佛，在实际造像中却用阿弥佛替代过去佛，成为新概念的三世佛。又，实例①巴中南龕盛唐第 64 龕刊刻“李朝兴三世石像赞”，实例⑧潼南千佛崖唐大中七年（公元 853 年）三佛龕题记：“敬造三世佛三身，右弟子□□愿平安，永为供养。”由此进一步证实，当时视这种组合为三世佛。

1 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页 31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实例⑨安岳庵堂寺唐咸通年间（公元 860 — 874 年）第 7 龕题记：“□□阿弥陀佛□□□□□□□造地藏菩萨一身，□为过往先祖、考妣，敬造□□□□佛一尊，弥勒尊佛一身并二菩萨、迦叶、阿难、十方佛身。□在太原，乃以太和正初权留当郡，受任县□□□□□□□□□□□□兹邑水陆□□□□□□蓝遭于会昌沙□□□□□□咸通岁初，方□难草□□□□……” 尽管其中一佛名磨泐，由缺字空格推测为释迦牟尼佛。又、实例⑩眉山法宝寺石窟乾德六年（公元 924 或 968 年）三佛龕题记：“敬造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尊佛，并观音、势至菩萨等一龕。弟子你思道等奉为亡母郭氏造”〔图十四〕。此二实例明确了这种组合中三佛各自的属性。

在尊像配置方面，表二中实例可以分作两种情况。实例②、③、④、⑥、⑦倚坐佛居中，依然出于对称构图的考虑。实例①、⑤、⑧、⑩倚坐佛居两侧，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其中实例⑤为坐北面南方向，倚坐弥勒佛却居右侧，与所属方位不符。实例①坐南面北，倚坐弥勒佛与结跏趺坐阿弥陀佛分别居右侧、左侧，即东方、西方，与此二佛属性符合，或许出自方位考虑。实例⑧坐东面西，倚坐弥勒佛与结跏趺坐阿弥陀佛分别居左侧、右侧，如果以假想的坐北面南正方向考虑，那么弥勒佛与阿弥陀佛恰好分别处在东方和西方。如下所述，该情



〔图十四〕眉山法宝寺乾德六年（公元 924 或 968 年）三佛龕题记

况在陕北石窟中普遍存在，实例⑧倚坐弥勒佛居左侧，很可能出于这种考虑。

在与其他图像组合方面，实例⑩三佛图像两侧配置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恰好与居中的阿弥陀佛构成西方三圣组合。然而，其中又加入释迦佛、弥勒佛，广泛意义的净土信仰成分得到强化。

（三）宋代释迦佛 + 弥勒佛 + 阿弥陀佛组合①

该组实例以组合中配置骑狮文殊、乘象普贤，或含十六、十八罗汉为特征，已知 9 例，附录相关实例 3 例，

〔表三〕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的三佛图像之三

石窟名称	中央佛坛造像			三壁浮雕			其他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右壁	正壁	左壁	
①富县柳园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石窟(坐西面东; 244×300×160)				▲	▲●■ △○□	■	千佛、自在观音
②子长钟山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第3窟(坐北面南; 1640×950×550)	■	●	▲				千佛、千菩萨、自在观音、涅槃○□△
③安塞招安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第3窟(坐北面南; 950×900×380)	毁坏	毁坏	■		○		自在观音

(续表三)

④甘泉石宫寺北宋末期第5窟(坐北面南; 588×618×390)	▲	●	■				自在观音
⑤延安清凉山北宋末期第2窟(坐东北面西南; 550×400×460)				△	▲●■ ○	□	自在观音
⑥安塞洞湾北宋末期大窟(坐西面东; 503×514×260)				△	▲●■	□	
⑦安塞新茂台北宋末期石窟(坐东南面西北; 290×196×230)				△	▲●■	□	
⑧安塞毛庄科北宋末期第1窟(坐北面南; 147×155×153)				△	▲●■	□	
⑨安塞毛庄科北宋末期第2窟(坐北面南; 260×375×205)				△	▲●■	□	
附录							
a延安清凉山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万佛洞 (坐东北面西南; 1700×1300×835)	毁坏	毁坏	毁坏				千佛、千菩萨、自在观音、千手观音、涅槃 ○□△
b安塞宋金之际沐浴石窟(坐南面北; 491×450×300)	毁坏	毁坏	毁坏	△		□	千佛、五百罗汉
c志丹何家圪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石窟(坐 东面西; 445×384×259)	●	▲	●	▲		■	千佛 ○
图例: 数字次序为横宽×进深×高 单位为厘米	三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其他	○十六或十八罗汉; □骑狮文殊; △乘象普贤					

具体如 [表三]。

据表三, 实例集中在北宋中晚期, 均分布在陕北地区, 一概为石窟造像。

石窟构造基本分作两种情况。一种为中央设置佛坛的方形或长方形窟, 三佛在佛坛上呈“一”字形排列, 有实例② [图十五]¹、③ [图十六]²、④ [图十七]³和附录 a [图十八]⁴、b [图十九]⁵、c [图二十]⁶; 另一种为周壁设置佛坛及无坛的方形或长方形窟, 有实例⑤

[图二十一]⁷、⑥ [图二十二]⁸、⑦ [图二十三]⁹、⑧ [图二十四]¹⁰、⑨ [图二十五]¹¹, 实例① [图二十六]¹²设置中心柱, 但尊像配置大体属于这一种。此组实例中对应的三佛像采用划一化手印, 即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佛像、倚坐施无畏印佛像、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佛像。关于此三佛的性质, 学界提出四种意见¹³。(1)、迦叶佛、释迦佛、弥勒佛, 即过去、现在、未来纵三世佛组合;(2)、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 即反映华严经思想的三身佛

1 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子长县文物管理所:《子长县钟山石窟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姬乃军:《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第10期。靳之林:《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文物》1984年第12期。

2 杨宏明:《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文博》1990年第3期。

3 张砚、李安福:《陕西省甘泉县佛、道石窟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

4 张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文物》1965年第5期。前引《延安地区的石窟寺》。

5 前引:《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

6 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页201、202,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7 前引《延安地区的石窟寺》。

8 前引《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

9 冉万里:《陕西安塞新茂台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6期。

10 冉万里:《陕西省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1年第1期。

11 前引《陕西省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调查简报》。

12 员安志:《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文博》1986年第6期。

13 (1)迦叶佛、释迦佛、弥勒佛(姬乃军:《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第10期;靳之林:《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文物》1984年第12期;李淞:《黄陵双龙千佛洞的图像、作者与观念》,《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页67—104,中华书局,2002年。韩伟:《陕西石窟概论》,《文物》1998年第3期。杨宏明:《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文博》1990年第3期)作为三世佛解释,认为三佛中的两佛分别是释迦佛、弥勒佛,但没有指明另一尊佛像的属性。(2)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子长县文物管理所:《子长县钟山石窟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孙修身:《陕西延安市清凉山万佛寺第2窟内容考》,《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3)释迦佛、无量寿佛、药师佛(姬乃军:《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第10期)。(4)释迦佛、弥勒佛、药师佛(冉万里:《陕西省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1年第1期;冉万里:《陕西安塞新茂台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6期)。



〔图十五：1〕



〔图十五：2〕



〔图十五：3〕

〔图十五：1、2、3〕子长钟山治平四年（公元 1067 年）第 3 窟右尊、中尊与左尊



〔图十六〕安塞招安元祐九年（公元 1094 年）第 3 窟



〔图十七〕甘泉石宫寺北宋末期第 5 窟



〔图十八〕延安清凉元丰元年（公元 1078 年）万佛洞左壁局部



〔图十九〕安塞宋金之际沐浴石窟



〔图二十：1〕志丹何家孤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佛坛造像



〔图二十：2〕志丹何家孤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佛坛造像左壁局部



〔图二十：3〕志丹何家孤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佛坛造像右壁局部



〔图二十一〕延安清凉山北宋末期第2窟正壁



〔图二十二〕安塞洞湾北宋末期大窟



〔图二十三〕安塞新茂台北宋末期石窟（前排像为新塑）



〔图二十四〕安塞毛庄科北宋末期第1窟



〔图二十五〕安塞毛庄科北宋末期第2窟



〔图二十六：1〕富县柳园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石窟正壁



〔图二十六：2〕富县柳园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石窟左壁

组合；(3)、释迦佛、无量寿佛、药师佛，即娑婆世界释迦佛与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组合；(4)、释迦佛、弥勒佛、药师佛，即娑婆世界释迦佛与未来弥勒下生净土弥勒佛、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组合。笔者认为，这四种意见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如上述第二组实例所示，造像分别为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值得注意的是，这组实例中的阿弥陀佛两手拇指指端与竖起的中指指端相合，有别于上述唐代阿弥陀佛造型。

在尊像配置方面，实例①—⑨中除实例③残缺之外，一概结跏趺坐施无畏印释迦佛居中。并且，实例



〔图二十六：3〕富县柳园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石窟右壁

坐施弥陀定印阿弥陀佛居右（实例③缺）。实例②以外，在剩余的8个实例中，4例为坐北面南的正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弥勒佛与阿弥陀佛恰好分别居东方、西方位置，符合其各自的属性。另4例采取同样配置方式，应该以石窟洞口所在为假想正方向考虑的结果。假想正方向的图像配置，在第二组四川晚唐摩崖龕像中已见端倪，在如下所述第四组实例中亦普遍存在，如此看来，石窟尊像配置的假想正方向确实存在。实例②弥勒佛与阿弥陀佛配置方位与它们各自属性不符，此窟佛坛上三主尊佛像系在他处雕刻后组合配置，不排除安装时错位的可能。另一种可能与此实例年代偏早，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尊像属性与方位的对应关系所致。附录c即志丹何家孤绍圣二年（1095）石窟中央佛坛上三佛（不明是否后世移动），有别于陕北石窟一般流行的三佛组合，不过左右壁分别配置弥勒佛与阿弥陀佛，合乎以石窟洞口所在为假想正方向的构想。此窟室内前壁门上方一具道教色彩仙山状图形上题记：“一佰一十人惟愿吃多遇父口石、母马口，愿早生天界，记之。”〔图二十七〕题记处在石窟中轴线上，又在门上方显著位置。此所谓天界可以理解为净土世界，与石窟的图像符合。实例①不仅正壁配置三佛，左右壁还配置弥勒佛与阿弥陀佛，意在强化净土信仰的成分。

还有一些不作为主尊表现的三佛，出现在陕北石窟中。诸如安塞黑泉驿石窟¹，右侧堂柱前面的千佛造像中存在三佛像〔图二十八〕。富县石泓寺第2窟²，中央佛坛主尊为降魔成道释迦佛，在正壁下方中间位置表现小型三佛〔图二十九〕，此三佛手印全然不同于上述三佛，中央结跏趺坐施触地印者应为释迦佛，左侧倚坐双手扶膝者应为弥勒，右侧者结跏趺坐两手交



〔图二十七〕志丹何家孤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石窟前壁局部



〔图二十八〕安塞黑泉驿北宋末期石窟千佛柱



〔图二十九〕富县石泓寺金代初期第2窟正壁局部

1 前引《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

2 前引《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

握,可看作特殊形式施禅定印,与陕北普遍流行的三佛相联系,推测为阿弥陀佛的表现。此外,由富县党家庄收集的北宋时期圆雕倚坐施无畏印弥勒佛、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阿弥陀佛,当初应为三佛组合。陕北北宋时期三佛图像广泛流行,表明当时人们普遍认同并接受这种弥勒净土与阿弥陀净土共崇的信仰方式。

在与其他图像组合方面,三佛与骑狮文殊、乘象普贤或十六、十八罗汉结合,形成显著新时代特征。实例①、⑤—⑨、附录b,在三佛两侧配置骑狮文殊、乘象普贤。乘象普贤见于《法华经》及法华系统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其造型北魏时期已经出现,初唐及以后与骑狮文殊合成一对图像,流行开来。骑狮文殊、乘象普贤作为一对图像,见于初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大正藏》第十八卷)卷一《金轮佛顶像法》,云:“欲画其像。取净白叠若净绢布。……结跏趺坐七宝庄严莲华座上。……其下左边画作文殊师利菩萨,身皆白色,顶背有光,七宝璎珞宝冠天衣种种庄严,乘于狮子。右边画作普贤菩萨,庄严如前,乘于白象。”(页790上)这对图像本来与密教金轮佛顶像组合在一起,在流行过程中游离出来,与多种大乘佛教尊像或其他密教尊像组合流行,此述表三相关实例也应属于这种情况。骑狮文殊、乘象普贤图像,一方面具有体现两者大智、大愿的功用,另一方面从其所处位置观察,应该还具有护法作用。

实例①、③、⑤正壁下方配置十六或十八罗汉。唐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大正藏》第四十九卷,以下简称《法住记》)云:“佛薄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如是十六大阿罗汉,一切皆

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勅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乃至世尊正法应住,常随护持。及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后至人寿七万岁时,无上正法方永灭没。时此十六大阿罗汉,……一时俱入无余涅槃……次后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为声闻众三会说法,令出生死,得证涅槃”(页13)。宣言阿罗汉在释迦佛涅槃之后,延长寿命,护持并传承正法,教化众生,直至弥勒佛出现世间。此后,罗汉信仰及图像逐渐流行开来¹。唐代流行忠实于《法住记》的十六罗汉。前蜀画家张玄在十六罗汉之前增迦叶、军徒钵叹尊者,贯休则在十六罗汉之后加庆友(即难提蜜多罗)、宾头罗尊者(重复第一尊),发展到十八罗汉。增加的两尊不固定,有时又换成了庆友和玄奘。十八罗汉出现后十六罗汉继续流行。可见,罗汉的主要功用在于传承佛法,而且与三佛中的弥勒佛关联。

陕北石窟中往往随意雕刻自在观音像。所谓自在观音,即唐周昉创绘游戏坐水月观音。水月观音创意受到《华严经》为主的多种经典影响,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九卷)卷五一《入法界品》云:“善才……渐渐游行光明山,周遍推求,登彼山上,见观世音菩萨住山西阿,处处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郁茂,地草柔软。结跏趺坐金刚宝座,无量菩萨恭敬围绕,而为演说大慈悲经,普摄众生……尔时善财诣观世音,头面礼足绕无数匝,恭敬合掌于一面住。白言,‘大圣,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页718上)。但水月观音通常没有采取该经典所说的结跏趺坐姿,经典中也没有净水瓶、杨柳枝的记述。另据东晋竺难

1 大村西崖:《罗汉图像考》,《禅月大师十六罗汉》,东京,审美书院,明治四十二年(1909);中村兴二:《十六罗汉图像学事始》,《佛教艺术》

第206号,1993年;中村兴二:《十六罗汉图像学事始卷下——伏虎罗汉》,《佛教艺术》第227号,1996年。

提译《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大正藏》第二十卷),杨柳枝和净水瓶与消除各种灾害有关,而且杨柳观音造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隋唐时期盛行一时,与杨柳枝、净水瓶关联的此经典或造型,应是水月观音造型中相同因素的来源。自在观音一方面体现清静自在的境界,与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契合,另一方面与观音的救济功能密切关联,后者尤其受到的重视。诚如元盛熙明述《补陀洛迦山传》(《大正藏》第五十一卷)记述:“释典所载菩萨名号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惟观自在洋洋赫赫功德显乎世间。凡遇厄难,竭诚称念,稽首请命,亦往往如响应。诚

由行愿弘深,大悲无碍之力也”(页1135中)。

(四)宋代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2)

该组实例以组合中配置涅槃图像为特征,已知6例,附录相关实例两例,具体列[表四]。

据表四,除实例⑥为陇东地区金前期遗迹外,其他均为陕北北宋末期遗迹。

石窟构造分作两种情况。一种为中央设置佛坛的方形或长方形窟,三佛在佛坛上呈“一”字形或“品”字形排列,有实例①[图三十]¹、③²、⑥[图三十一]³及附录a⁴、b⁵,另一种为周壁设置佛

[表四]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的三佛图像之四

中央佛坛与三壁雕刻 石窟名称	中央佛坛造像			三壁浮雕			其他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右壁	正壁	左壁	
①黄陵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万佛寺石窟(坐西面东;918×845×516)	▲	●	■		△○□		五百罗汉 自在观音 千手观音
②富县阁子头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第1窟(坐南面北;520×434×207)				△	▲●■	□	五百罗汉
③安塞樊庄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第2窟(坐北面南;680×680×300)	▲	●	■	普贤	○	□△ 文殊	五百罗汉
④子长钟山北宋末期第4窟(坐北面南;370×350×320)				▲	△○□	■ 文殊	五百罗汉 自在观音
⑤富县石坊头北宋末期石窟(坐南面北)				□	▲●■	□	罗汉
⑥合水安平寺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石窟(坐南面北;371×371×361)	毁坏	毁坏	■		□		五百罗汉 自在观音
附录							
a富县石佛堂北宋末期第5窟(坐西面东;486×468×334)	毁坏	毁坏	毁坏	□	○	△	五百罗汉
b富县马渠寺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第2窟(坐北面南;516×493×340)	毁坏	毁坏	毁坏	□	○	△	五百罗汉
图例: 数字次序为横宽×进深×高 单位为厘米	三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涅槃图	○临终说法; □入涅槃; △金棺说法					

1 前引《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黄陵县万佛洞〉介绍中有关问题的补充和订正》,《文物》1966年第2期。

2 前引《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

3 张宝玺:《合水平定川石窟群》,《陇右文博》2003年第1期。

4 前引《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

5 前引《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



〔图三十〕黄陵绍圣二年（公元 1095 年）万佛寺石窟中央佛坛



〔图三十一〕合水安平寺大定十八年（公元 1178 年）石窟中央佛坛

坛及无坛的方形或长方形窟，有实例②¹、④〔图三十二〕、⑤〔图三十三〕。

三佛造型与上一组一致，分别为结跏趺坐施无畏印释迦佛、倚坐施无畏印弥勒佛、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阿弥陀佛。

在尊像配置方面，能够分辨的诸实例，一概释迦佛居中，弥勒佛居左，阿弥陀佛居右。在全部 8 个实例中，只有两个为正方向。由此可知，这些实例以石窟洞口所在方向为假想的正方向，使得未来弥勒佛、西方阿弥陀佛所代表的两方净土能够处在相应位置。

在与其他图像组合方面，三佛与涅槃图像结合成为典型特征。涅槃图像一般包括临终说法、入涅槃、金棺说法三个场面，其中临终说法处在中央位置。子长钟山第 4 窟正壁中央临终说法场面中释迦佛，同时与左右侧壁的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成三佛。

五百罗汉为十六或十八罗汉信仰的扩充，在这些实例中完全融合在涅槃经变之中，代替以往涅槃经变或图像中经常出现的弥勒菩萨或弥勒佛，发挥释迦

佛涅槃后住法与传法的作用²。实际，五百罗汉成为与涅槃经变平行的内容，然而，造像记甚至没有提及涅槃经变内涵。诸如实例①黄陵绍圣二年（1095）双龙万佛寺石窟题记：“紉首苑广、苑晟、李升、明和四人等，镌造石空寺佛殿后壁一面伍百罗汉，并部徒共六百仕。伏愿皇帝万岁，臣左千秋，禄位常居，国泰民安。四恩三有，同成佛果。”实例②富县阁子头政和二年（1112）第 1 窟题记：“施主平泉村皇甫吉、男皇甫晟……又打造石空一所，亦有释迦九士、五百罗汉”。附录 b 富县马渠寺崇宁五年（1106）第二窟题记：“施主王松自法（发）心，造伍百罗汉一堂，妆饰了毕”。可见在信徒的心目中罗汉信仰占据上风。不过，涅槃经变的三个场面分别占据三壁中央位置，其主体性不容忽视。涅槃经变中的入涅槃、金棺说法场面，又强调了当时社会倡导的孝道思想。

在陕北、陇东石窟中，三佛通常雕刻在中央佛坛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弥勒佛一般居三佛组合的左侧，很难看出与涅槃图像间的必然联系，从前具有

1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鄜县石泓寺、阁子头寺石窟调查简报》，《文物》1959 年第 12 期。前引《延安地区的石窟寺》、《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

2 李静杰：《中原北方宋辽金涅槃图像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3 期。



〔图三十二〕子长钟山北宋末期第4窟正壁



〔图三十三〕富县石坊头北宋末期正壁

的传法作用不复存在。涅槃、罗汉与三佛图像的組合，难以说存在教义上的直接联系。但是，涅槃、罗汉、东方净土与西方净土的图像构成，不难看出信徒们在释迦佛灭度之后，将佛法守护与传承的使命寄托到罗汉身上，以及向往并期望将来往生净土世界之心态。

二 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 自由组合的三佛与四佛图像

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的自由组合，将近占笔者统计三佛图像总量的 1/5，为唐宋时期比较流行的三佛组合形式。已知者全部为唐代实例，除个别出现在北方之外，其他均分布在四川。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的四佛组合，是在三佛图像基础上产生的特殊形式，流行于唐五代时期。

相对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及其代表的净土诸佛属于后起的信仰对象。据隋达摩笈多译《佛说药

师如来本愿经》（《大正藏》第十四卷）序，早在南朝宋，该经已经汉译并流行于世，而语意不够畅达，为人所疑惑，因此隋代重译¹，为药师信仰的流行创造契机。时至初唐，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正藏》第十四卷），唐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大正藏》第十四卷），为药师信仰流行注入新鲜活力。达摩笈多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序云：“药师如来本愿经者，致福消灾之要法也。曼殊以慈悲之力请说尊号，如来以利物之心盛陈功业。十二大愿彰因行之弘远，七宝庄严显果德之纯净。忆念称名则众苦咸脱，祈请供养则诸愿皆满。至于病士求救应死更生，王者攘灾转祸为福。信是消百怪之神符，除九横之妙术矣”。药师经有如此神奇灵验效果，吸引着善男信女遵守奉行，药师佛造像应运而兴。就已知资料，药师佛造像出现于北朝末年，唐代逐渐流行开来。而与其他尊像形成三佛、四佛组合，则是人们融合多种佛教净土信仰的结果。

1 隋达摩笈多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大正藏》第十四卷）序云：此经“昔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门慧简已曾译出，在世流行。但以梵宋不融，文辞杂糅，致令转读之辈多生疑惑。矩早学梵书，恒披叶典，思遇此经，验其讹谬（页401上）”。

(一) 唐宋时期释迦佛 + 阿弥陀佛 + 药师佛组合

据表五，实例①〔图三十四〕¹为川北唐初遗迹，实例②〔图三十五〕²为川东宋代遗迹。

托钵或捧钵为确定药师佛属性的标志，在唐代中原北方与四川具铭文题记造像中得到证实。实例①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佛像、实例②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佛像，为阿弥陀佛造型，已如前所述。基于当时佛教

[表五] 释迦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组合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			其他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广元皇泽寺新发现唐初龕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两手残缺)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两手残缺)	结跏趺坐托钵施并无畏印(右手残缺)	
②安岳圆觉洞宋代不动明王龕	结跏趺坐捧钵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不动明王

造像的一般情况，此二实例中剩余的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及施无畏印佛像，只有比定为释迦佛才比较合理。于是，形成释迦佛居中，两侧配置阿弥陀佛、药师佛，即以娑婆世界释迦佛为中心，东方药师净土与西方阿弥陀净土对置的布局。这种组合的出现，推测是净土信仰滋长和蔓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此二实例没有题记资料，根据元代相同三佛组合的题记³，推测也是三世佛的一种。

又，隋达摩笈多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云：“复次曼殊室利，此诸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余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受八分斋，或复一年或复三月受持诸戒，以此善根，随所愿乐随所愿求。若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所者，由得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故，于命终时有八菩萨乘空而来示其道径，即于彼界种种异色波头摩华中自然化生。若复此人欲生天上，即得往生。本昔善根无有穷尽，不复更生诸余恶趣。天上命尽，当生人间为转轮王，四洲自在，安立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众生于十善业道。

或复生于刹利大族婆罗门大族居士大家，金银粟帛仓库盈满，形色具足，自在具足，眷属具足。”（页402下）《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的教主为释迦佛，经文所说又将阿弥陀佛与药师佛联系在一起，恰好符合释迦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三者组合。尽管如此，却不能够说明基于这种教义的三佛组合。至于实例②三佛与不动明王组合，尚未找出教义上的联系。

(二) 唐代释迦佛 + 弥勒佛 + 药师佛组合

据表六，这种组合流行于中晚唐时期，实例①〔图三十六〕⁴、②⁵分布在川中，实例③〔图三十七〕⁶在陕北。

基于前文论述，表六实例中结跏趺坐施无畏印或触地印佛像、倚坐施无畏印或自然手印佛像、结跏趺坐托钵或捧钵施无畏印佛像，应分别比定为释迦佛、弥勒佛、药师佛。推测这是适应信徒多样的净土信仰需要，形成的自然组合。本来弥勒佛作为未来佛，通常将他所代表的一方净土看作东方净土，而药师佛

1 新近发现，承广元皇泽寺博物馆王剑平先生厚意得以调查。
2 胡文和、陈昌其：《浅谈安岳圆觉洞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傅成金：《再谈安岳圆觉洞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1年第6期。
3 温玉成：《泉州三世佛造像再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4 前引《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页58。
5 曹恒钧：《四川夹江千佛岩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6 刘合心、段双印：《洛川县寺家河唐代佛教密宗造像石窟》，《文博》1992年第5期。



〔图三十四〕广元皇泽寺新发现唐初龕



〔图三十五〕安岳圆觉洞宋代不动明王龕上方



〔图三十六〕蓬溪新开寺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第4窟（部分改造）



〔图三十七〕洛川寺家河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石窟正壁

〔表六〕释迦佛+弥勒佛+药师佛组合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			备注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蓬溪新开寺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第4窟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托钵施无畏印	部分改造
②夹江千佛崖中晚唐第54龕	结跏趺坐捧钵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触地印	倚坐施无畏印	与骑狮文殊、乘象普贤组合
③洛川寺家河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石窟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托钵施无畏印	倚坐自然手印	与八菩萨组合

所代表净土本身是东方净土，因此，此三佛配置难以做到方位上的协调。

实例①蓬溪新开寺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第4窟题记：“三世佛龕并坐口一铺。右比丘凝照、惠朗等病疾，发愿奉为上界天仙、人王帝主、州县牧宰、

乡闾栋梁、过现存亡、师僧父母、十方施主、法界众生、一切含灵，同沾此福，普为敬造供养”。“右弟子黄才光及妻菩萨戒行女李波若，行施金薄彩色钱一十五千文，愿百病除。老夫黄才光男女大小各乞平安，同施助成功德”〔图三十八〕。由此可知，当时亦称释迦佛、

弥勒佛、药师佛组合为三世佛。期待去除疾病的心愿尤其突出，契合药师佛的属性，值得注意。

实例③洛川寺家河开成元年（公元 836 年）石窟，正壁以药师佛为中心配置三佛，两侧壁分别配置四立菩萨。正如上隋达摩笈多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所述，信徒因为尊崇药师琉璃光佛，若欲往生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临命终时有八菩萨乘空而来指示道路，即在彼方种种异色波头摩华中自然化生。显然，此窟主体内容意在表述该经典所说的教义内涵。但弥勒佛代替阿弥陀佛存在，反映了信仰与雕刻的随意性。



〔图三十八〕莲溪新开寺贞元之年（公元 785 年）第 4 窟左壁

（三）唐代阿弥陀佛 + 弥勒佛 + 药师佛组合

据表七，这种组合流行于盛唐至晚唐时期，实例①〔图三十九〕¹、②〔图四十〕²分布在川中，实例③³、④〔图四十一〕⁴、⑥〔图四十二〕⁵分布在川东地区，实例⑤〔图四十三〕在北方。尽管北方只有 1 例，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美术发展共通性的一面。

诸实例中三佛分别为倚坐施无畏印弥勒佛、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或施弥陀定印阿弥陀佛、结跏趺坐禅定捧钵或托钵施无畏印药师佛。比较以上实例，此三佛不包含娑婆世界释迦佛，全部换成净土世界诸佛。

这是当时人们对净土世界怀着极大热情和希望，囊括那个时代流行的主要净土信仰，不局限某一方具体净土而选择的结果。据实例⑥大足北山光化二年（公元 899 年）第 51 龕题记：“三世佛并部众……节度左押衙充四州都指挥□□□□昌州军事银青□□□□上柱国王宗……为女……十二娘……庆赞毕”。可知这种组合当时亦称作三世佛。

表七中实例①—④，以倚坐弥勒佛为中心配置三佛，着眼点在于造型的均衡。结跏趺坐阿弥陀佛、

〔表七〕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组合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邛崃石荀山盛唐第9龕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禅定捧钵
②乐山大佛岩壁盛唐三佛龕	结跏趺坐禅定捧钵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③安岳侯家湾盛唐第13龕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托钵施无畏印
④安岳千佛寨盛唐第44龕	结跏趺坐禅定捧钵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⑤五台山佛光寺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大殿	结跏趺坐托钵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	倚坐施无畏印
⑥大足北山光化二年(公元899年)第51龕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结跏趺坐一手托钵	倚坐施无畏印

1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邛崃市文管所：《邛崃石荀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3）》，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 周俊其：《乐山大佛石窟寺及佛像石刻艺术研究》，《四川文物》1995 年第 1 期。

3 刘长久主编：《安岳石窟艺术》，图版 47，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

4 唐承义：《千佛寨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9 年第 2 期。

5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石刻铭文录》页 14，重庆出版社，1999 年。



〔图三十九〕邛崃石荀山盛唐第9龕



〔图四十〕乐山大佛岩壁盛唐三佛龕



〔图四十一〕安岳千佛寨盛唐第44龕



〔图四十二〕大足北山光化二年（公元899年）第51龕



〔图四十三：1〕



〔图四十三：2〕



〔图四十三：3〕

〔图四十三：1、2、3〕五台山佛光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大殿右尊、中尊与左尊

结跏趺坐药师佛配置在左侧或右侧不定，表明施主或造像者没有基于诸佛属性，将东方药师佛净土与西方阿弥陀佛净土按方位对称配置的概念。实例⑤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强调了西方极乐净土信仰。实例⑥以药师佛为中心的三佛配置，则是突出《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教义的结果。

（四）唐五代时期释迦佛 + 阿弥陀佛 + 弥勒佛 + 药师佛组合

据表八，实例①〔图四十四〕¹为成都周围盛中唐石窟，实例②〔图四十五〕²为广州南汉铁塔。

二实例中结跏趺坐施无畏印释迦佛、倚坐施无畏印弥勒佛、结跏趺坐禅定捧钵或托钵药师佛、结跏趺



〔图四十四〕仁寿牛角寨盛中唐第 23 龕

〔表八〕释迦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组合的四佛图像

造像名称	图像	四佛			
		第一尊	第二尊	第三尊	第四尊
①仁寿牛角寨盛中唐第23龕		结跏趺坐禅定捧钵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②广州光孝寺大宝六年(公元963年)西铁塔第一层		南面释迦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东面药师佛 结跏趺坐右手残缺	北面弥勒佛 倚坐施无畏印	西面阿弥陀佛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坐施弥陀定印阿弥陀佛，造型与以上各组实例一致。此组合将娑婆世界释迦佛与三方净土世界诸佛组合，推测在净土信仰风靡的大环境中自然形成，不存在教义上的内在联系。实例②广州光孝寺大宝六年（公元 963 年）西铁塔第一层诸佛尊像的配置方位（并非现在放置状态中各面所在方位），基本符合它们各自的属性。南北分别配置释迦佛、弥勒佛，亦即当今娑婆世界释迦佛与未来弥勒佛形成一对图像，释迦佛作为各种经典的说法者，处在正面合乎情理。东方净琉

璃世界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恰好按各自所属方位对称配置。

这两个实例，可以看作以上各组实例的总汇，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人们祈求净土，又无所侧重的盲目崇拜风气。下面将中原地区两个唐代四佛实例列出〔表九〕，以作比较。

观察表九可知，实例 a³、b〔图四十六〕⁴均雕刻倚坐施无畏印弥勒佛，实例 a 者处在东面，实例 b 者原初也应在东面位置。实例 a 南面雕刻半跏趺坐施

1 邓仲元、高俊英：《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0 年第 5 期。
2 罗香林：《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第十章《光孝寺之南汉千佛塔》页 163 — 172，香港，中国学社，1960 年。
3 荆三林、张鹤云：《神通寺龙虎塔的造型与年代》，《文物参考资料》

1956 年第 11 期。
4 王晶：《神宝寺四方佛》，《文物》1986 年第 8 期；王晶等主编：《灵岩寺》页 47，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图四十五：1〕



〔图四十五：2〕



〔图四十五：3〕



〔图四十五：4〕

〔图四十五：1、2、3、4〕广州光孝寺大宝六年（公元963年）两铁塔东面〔1〕、北面〔2〕、西面〔3〕、与南面〔4〕

[表九] 唐代其他四佛图像举例之一

造像名称	四佛			
	东面	北面	西面	南面
a历城神通寺盛唐龙虎塔四方佛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半跏趺坐施无畏印
b长清灵宝寺盛唐四方佛	第一面 倚坐施无畏印	第二面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第三面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第四面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无畏印佛，这种造型曾经在定州区域北朝晚期、隋代作为弥勒佛出现过，但实例有限而且迅速消失。实例 a 中已经出现弥勒佛像，其半跏趺坐佛像似乎难以看作弥勒表现。此二实例中其他佛像均为结跏趺坐施无畏印造型，缺乏明显的个性标志。这样看来，实例 a、b 应该作为四方佛表现，在造型上除弥勒佛之外，其他佛像又没有可以用作区别属性的特征。因此，实例 a、b 具有一定的表现随意性，与 [表八] 实例 ①、② 具有明确属性和方位的四佛图像比较，存在本质差异。仅存的少量实例说明，释迦佛 + 阿弥陀佛 + 弥勒佛 + 药师佛组合的四佛图像，没有能够获得大发展的契机。



[图四十六] 长清灵宝寺盛唐四方佛

三 对称构图的不明确三佛图像

在三佛图像中，存在一些分别以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为中心，两侧配置结跏趺坐施同一手印又难以辨别属性的佛像，还有三立佛像实例。两侧佛像的作用似乎在于辅助并强化中央佛像。这种类型实例仅占笔者统计三佛总量的 1/10 左右，是三佛造像中的特殊形式。

(一) 唐代阿弥陀佛 + 二辅助佛组合

据表十，实例① [图四十七]¹、② [图四十八]²，

以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或弥陀定印阿弥陀佛为中心，两侧配置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佛像。实例①安岳卧佛院盛唐第 54 龕所在的第 51 经文窟刊妆修题记：“敬再修妆三身佛并经龕同一座，右佩法弟子王彦昭先发愿修妆上件功德，并已周备，意希自身清吉，眷属□圆。时广政二十二年（公元 959 年）岁次己未，十月癸酉三十日，前龙州军事兼普州军事雅推五音地理王彦昭造供养”。此所谓三身佛，显然就数量而言。可见在五代妆修时，当事人已经不清楚原初三佛的属性。实例②安岳圆觉洞晚唐第 33 龕妆修题记：“写此善无涯，刻石记之，用彰不朽，时大蜀天汉元年（公元 917 年）太岁丁丑九月

1 彭家胜：《四川安岳卧佛院调查》，《文物》1988 年第 8 期；邓之金：《安岳卧佛院摩崖造像上限年代探讨》，《四川文物》1993 年第 2 期。

2 胡文和、陈昌其：《浅谈安岳圆觉洞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6 年第 1 期；傅成金：《再谈安岳圆觉洞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1 年第 6 期。



〔图四十七〕安岳卧佛院盛唐第 54 龕



〔图四十八〕安岳圆觉洞晚唐第 33 龕

〔表十〕阿弥陀佛+二辅助佛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图像	三佛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安岳卧佛院盛唐第54龕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转法轮印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②安岳圆觉洞晚唐第33龕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十八日斋赞毕。高徒贮□，添粟千箱，典易经某，收金万两。先亡七祖，并愿离苦升天……本是三尊，众愿修妆，不改三圣，丹彩晃耀，粉绘辉华。旧功德主重新……”。此妆修者既从前雕刻三佛的施主，妆修时仅简单地称作“三圣”，似乎施主本人也不很清楚三佛的实际属性。

（二）唐代弥勒佛 + 二辅助佛组合

据表十一，实例①〔图四十九〕¹、②〔图五十〕²分别为川中盛唐，安阳盛中唐之际作品。两者均以倚坐施无畏印弥勒佛为中心，两侧配置结跏趺坐施相同

〔表十一〕弥勒佛+二辅助佛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图像	三佛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仁寿牛角寨盛唐第25龕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②安阳修定寺塔门楣盛中唐之际三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倚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手印佛像。此二实例突出了中央弥勒佛及其代表净土的信仰成分，两侧佛像由于缺乏属性特征，难以判断所指，或许本身为突出弥勒佛而配置，形成泛指の三世佛组合。

（三）唐代药师佛 + 二辅助佛组合

仅见〔表十二〕成都周围盛唐时期一个实例〔图五十一〕³。以结跏趺坐禅定捧钵药师佛为中心，两侧配置结跏趺坐施无畏印缺乏属性特征的佛像，形成泛指の三世佛组合。

1 邓仲元、高俊英：《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0年第5期。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安阳修定寺塔》页21，文物出版社，1983年。
3 前引《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页19。

[表十二] 药师佛+二辅助佛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			其他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蒲江飞仙阁盛唐第36龕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禅定捧钵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辅助二立佛

（四）唐代三立佛像组合

三立佛像实例罕见。据表十三，实例①〔图五十二〕¹、②〔图五十三〕²分别为川北、川东地区盛唐时期实例。两者均以施转法轮印阿弥陀佛为中心配置。实例①两侧佛像分别施无畏印、握袈裟，这种差异可能出于避免雷同的考虑。实例②两侧佛像亦施转法轮印，但显然不能认为都是阿弥陀佛。实例②安岳千佛寨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第38龕题记：“前安岳县骑都尉勋官五品黎令宾，愿造东面三世诸佛□□□□亡父亡母及亡□，造西面救苦观音菩萨一龕三身，并永为□□”。可知此三佛像被称作三世佛。具体所指又不明确，或许施主本人就是一种模糊的概念认识。

实例①以阿弥陀佛为中心三佛与观音、地藏组合，在突出西方极乐净土信仰的同时，关注着现实世界观音菩萨的救济，以及阴间世界地藏菩萨的救助。实例②以阿弥陀佛为中心三佛龕与观音龕毗邻雕刻，同样强调西方极乐世界信仰和观音菩萨现世救济职能。

四 与华严经思想关联的三佛图像

辽宋时期出现并流行华严与净土结合三佛，以及华严性质的三身佛。前者意味华严思想与净土信仰相融合，后者反映了华严思想与密教混合的情况。

（一）宋代华严净土三佛组合

已知仅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南宋圆觉洞（第29窟）一例〔图五十四〕³。中央为结跏趺坐施拱手印着宝冠佛像，此造型见于安岳石羊场毗卢庵、大足宝顶山小佛湾毗卢庵南宋柳本尊十炼图像⁴，为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或毗卢遮那佛的造型。拱手印佛像较早实例，见于前述广州光孝寺南汉大宝六年（公元963年）西铁塔，题记“卢遮那佛”，应即毗卢遮那佛的简称。看来安岳、大足毗卢遮那佛的拱手印造型有前例可援，不过，光孝寺毗卢遮那佛并非宝冠佛像。宝顶山圆觉洞毗卢遮那佛的左右侧，分别配置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阿弥陀佛、结跏趺坐禅定捧钵药师佛，形成华严与净土结合三佛。如果考虑该窟坐南面北的方位，那么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正好处在各自所

[表十三] 唐代三立佛像的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			其他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广元千佛崖盛唐第251龕	施无畏印	施转法轮印	握袈裟	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②安岳千佛寨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第38龕	施转法轮印	施转法轮印	施转法轮印	与观音龕同时雕刻

1 广元皇泽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石窟》页68、69，巴蜀书社，2002年。

2 前引《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页71。

3 童登金、胡良学：《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圆觉经变”窟的调查研究》，《四川文物》2000年第4期。

4 李静杰、黎方银：《大足安岳宋代石窟柳本尊十炼图像解析》，载《2005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图四十九〕仁寿牛角寨盛唐第 25 龕



〔图五十〕安阳修定寺塔门楣咸通十一年（公元 870 年）三佛



〔图五十一〕蒲江飞仙阁盛唐第 36 龕



〔图五十二〕广元千佛崖盛唐第 251 龕



〔图五十三〕安岳千佛寨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 年）第 38 龕



〔图五十四〕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南宋圆觉寺（第 29 窟）正壁

[表十四] 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			其他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南宋圆觉洞(第29窟)	结跏趺坐禅定捧钵	结跏趺坐施拱手印着宝冠	结跏趺坐施弥陀定印	五十三参十二圆觉菩萨

属位置。此三佛组合毋宁说在注重华严经思想同时，吸收了净土信仰，难以说存在教义上的内在联系。

两侧壁上方表现的五十三参，出自东晋佛驮跋陀罗译 60 卷或唐实叉难陀译 80 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九、十卷）《入法界品》。讲述善财童子寻求法门要义，得到文殊菩萨的指引，参拜五十三位善知识，最终参见普贤，得一切佛刹微尘数三昧门。五十三参图像与正壁中央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呼应，反映了华严经游方求法的思想。

两侧壁下方表现的十二圆觉菩萨，出自唐佛陀多罗译（一说中国佛教徒编纂）《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大正藏》第十七卷）。宣讲佛为文殊、普贤等十二位菩萨解说如来圆觉的妙理和观行方法，唯显如来境界，合乎华严经圆摄一切诸法的旨趣。此经被中晚唐宗密禅师列入华严系统，并由于其人大力倡导盛行于世。可见华严经与圆觉经在教义上本身是融通的。于是，在图像上出现毗卢遮那佛与十二圆觉菩萨组合的现象。

（二）辽宋时期华严三身佛组合

据表十五，实例①¹、②〔图五十五〕²为辽南宋代遗物，实例③〔图五十六〕³为川北宋遗迹。

华严经三身佛是汉地佛教中滋长出来的概念。小乘佛教与法华经代表的初期大乘佛教，以释迦牟尼佛为法身佛。中国汉文化地区华严经思想兴起之后，出现大乘三身佛概念。北魏菩提流支译《十地经论》（《大正藏》第二十六卷）卷三《初欢喜地》云：“一切佛者有三种佛。一应身佛，二报身佛，三法身佛。”（页 138 中）隋智顗《妙法莲华经文句》（《大正藏》第三十四卷）卷九云：“三如来者……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为如，不动而至为来，指此为法身如来也。法如如智，乘于如如真实之道，来成妙觉，智称如理，从理名如，从智名来，即报身如来。……八相成道转妙法轮，即应身如来。……法身如来名毗卢遮那，此翻遍一切处。报身如来名卢舍那，此翻净满。应身如来名释迦文，此翻度沃焦。是三如来若单取者则不

[表十五] 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佛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			其他图像
	右尊	中尊	左尊	
①朝阳北塔重熙十二年(公元1043年)天宫石函刻画三佛	结跏趺坐施智拳印菩萨(题“法□□”)	结跏趺坐双手两侧外扬(题“报□□”)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题“化身佛”)	
②朝阳北塔重熙十二年(公元1043年)天宫木胎银棺刻画三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双手两侧外扬	结跏趺坐施智拳印着菩萨装	与涅槃、弥勒组合
③大足石篆山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第7龕三佛	结跏趺坐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施智拳印菩萨装	结跏趺坐施触地印	释迦佛十大弟子

1 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 年第 7 期。

2 前引《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

3 胡良学、陈静：《大足石篆山、妙高山摩岩造像的调查研究》，《四川文物》1998 年第 1 期。



〔图五十五〕朝阳北塔重熙十二年（公元1043年）天宫木胎银棺刻画三佛



〔图五十六：1〕大足石篆山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第7龕三佛

则不可也。”（页127下）尔后，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代替释迦牟尼佛成为法身佛，原来具有法身性质的释迦牟尼佛转化为应身佛。

实例①结跏趺坐施智拳印菩萨、结跏趺坐双手两例外扬佛、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佛，由题记知三者分别为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或应身佛），即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实例②尽管没有题记，造型与实例①一致，应为相同属性三佛。实例③三佛中央结跏趺坐施智拳印菩萨与实例①、②造型相同，应为法身毗卢遮那佛。左侧结跏趺坐施触地印佛像采用成道像造型，推测为化身释迦牟尼佛。右侧佛像缺乏属性标志，推测为报身卢舍那佛。以上实例构成华严三身佛组合。其中法身毗卢遮那佛为施智拳印菩萨造型，不同于安岳、大足宋代柳本尊十炼图像中施拱手印着宝冠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这种施智拳印菩萨造型与密教金刚界大日如来一致，如印度奥里萨邦 Udayagiri 9 世纪前后金刚界大日如来〔图五十七〕¹、扶风法门寺塔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地宫出土银质鎏金宝函铸造曼荼罗图像中大日如来²。可见，



〔图五十六：2〕大足石篆山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第7龕三佛局部



〔图五十七〕印度奥里萨邦 Udayagiri 9 世纪前后金刚界大日如来

1 肥塚隆、宫治昭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14卷・インド（2）》图版87，小学馆，1999年。

2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实例①、②、③中施智拳印菩萨，为金刚界大日如来（即大毗卢遮那佛）造型，作为华严经三身佛中法身毗卢遮那佛出现，兼具两者属性。此外，合川濮岩寺石窟造像记：“夫法身……今兹石壁，是谓古龕，佛像既隳，僧来□骨。厥有州郭弟子赵元福、赵仁普等，同发心请匠，镌造法、报、化三身共一龕，命工庄彩，备供庆酬。各希门业以昌隆，咸保运□而亨泰，先灵祖乃仗此升天，债主冤家凭兹解脱。以皇宋天禧三年（公元 1019 年）己未岁十二月八日镌造，永为供养。时皇宋天圣三年（公元 1025 年）岁次乙丑三月甲申修斋庆表记。”¹ 尽管不清楚此龕造像的实际情况，造像记则明确题记三身佛龕，尤其填充了北宋前期三身佛造像的空缺，弥足珍贵。

在实例②中，涅槃与弥勒组合反映了传法思想。三身佛与涅槃组合，则是将涅槃作为释迦佛化身的一种，亦即化现，或作为方便说法的手段，所谓权道²。实例③三身佛与释迦佛之十大弟子组合的含义尚不清楚。

五 释迦佛 + 弥勒佛 + 迦叶佛
组合的三佛图像

该类型三佛组合实例稀少，年代也相对相对滞后。
表十六实例，据常乐寺现存金正隆四年（公元

1159 年）“重修三世佛殿之记”碑记述得知³。碑铭云：“自皇统八年（公元 1148 年）九月乙亥，讫天德二年（公元 1150 年）六月甲寅殿成。高广宏□，冠□一方。□于其中塑三世佛像，中尊释迦当见在贤劫，弥勒居左当未来星宿劫，迦叶居右当过去庄严劫。贞元二年（公元 1154 年）正月癸亥始之塑像，时师彦未能毕其说……正隆二年（公元 1157 年）秋，专遣人致书，云所造尊像去年九月丁卯亦以工毕。因具道所以为求托之意。三世佛见于浮屠氏之说者多矣，故学佛之徒以像示人。然佛若觉□称，非色非声，无形可拟。非名非数，无相可观。非去非来，不胶其用，非久非近，不拘其时。而三世三劫灭□□□佛名号，过去未来又各有百千万亿那由陀（他）佛，焉知其未来者俱非过去，而过去者俱非见在者耶。是由也，予皆不能知之。第以彦师之志勇猛精进，率□□此胜□，使圣贤之居妙尽庄严，一乡之民有所归向，其功□不可胜道。因并书其尝语予者，志岁月云尔。正隆三年二月八日记。……正隆四年……立石。”由此可知，大殿之中明确塑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之所以塑造纵向三世佛，推测基于佛教流行的三世佛概念而来，而施主似乎并没有特定的佛教尊像崇拜取向。此重修三世佛殿记的撰述者，即宣奉大夫刑部尚书护军胡大砺本人，对三世佛的理解也很模糊。那么，该三世佛塑像，实际缺乏可靠的佛教信仰内涵支撑。

[表十六] 释迦佛+弥勒佛+迦叶佛组合的三佛图像

造像名称	三佛		
	右尊	中尊	左尊
武安县常乐寺三世佛殿金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泥塑三佛	迦叶佛(无存)	释迦佛(无存)	弥勒佛(无存)

1 龙显昭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页 97，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 年。

2 李静杰：《中原北宋辽金涅槃图像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3 期。

3 张林堂主编：《响堂山石窟碑刻题记总录》（贰）页 165－167，外文出版社，2007 年。

小结

如上所述,第一种(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的三佛),第二种(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自由组合的三佛与四佛),第三种(对称构图的不明确三佛)图像,均与净土信仰密切相关。造像记中三佛属性明确的实例,几乎记述为三世佛。不过,此所谓三世佛,为娑婆世界释迦佛、弥勒下生净土弥勒佛、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中三者组合,其组合并不固定,均为突出美妙净土信仰的横向三世佛,与南北朝流行的过去、现在、未来纵向三世佛大相径庭¹。

横向三世佛组合是净土信仰滋长的结果,渊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晚期至隋代。诸如,河北灵寿祁林院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高睿造释迦佛、阿閼佛、弥勒佛、无量寿佛四像²,将代表理想世界的诸佛组合在一起,并非基于某一经典表现³。以下两例在传统法华经图像中,表现诸多代表净土世界的佛陀、菩萨。其一是河南浚县北齐武平七年(公元572

年)造像碑,雕刻释迦佛、弥勒菩萨、无量寿佛、阿弥陀佛、药师佛诸像。其二是河南滑县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造像碑,雕刻释迦佛、弥勒菩萨、无量寿佛、阿弥陀佛、香积佛诸像⁴[表十七]。在这些组合中,释迦佛以外的弥勒菩萨和其他诸佛,代表各具含义的美好世界。佛教徒出于笼统的净土信仰需求,将缺乏教义联系的诸佛、菩萨组合在一起,甚至将相同尊格不同称呼的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一并表现⁵。上述实例已经出现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及药师佛,构成本稿所述三佛组合的基本要素。

入唐以后,净土信仰获得大发展的契机。北朝盛行的代表弥勒上生净土的弥勒菩萨造像不再流行,从前流行的释迦佛、代表弥勒下生净土的弥勒佛造像延续下来,但数量有所减少。北朝晚期获得初步发展的代表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造像,数量急剧增加,成为唐代最受崇拜的佛教偶像。洛阳龙门石窟拥有大量唐代造像和题记,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变化过程⁶。而且,在唐代净土信仰的大潮中,弥勒佛、药师佛造像亦受到重视,尤其前者又与武则天

〔表十七〕浚县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造像碑与滑县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造像碑图像配置示意图

碑阳	左侧面	碑阴	右侧面
交脚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九龙灌水	维摩·文殊
释迦佛	普贤菩萨	思惟菩萨	涅槃
阿弥陀佛	无量寿佛	释迦·多宝佛	药师佛

碑阳	左侧面	碑阴	右侧面
香积佛	弥勒菩萨	阿弥陀佛	无量寿佛
释迦佛	普贤菩萨	释迦·多宝佛	思惟菩萨
维摩·文殊	双定光佛	涅槃	观世音菩萨

1 贺世哲:《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诸问题一》,《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

2 刘建华:《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相关文物遗存》,《文物》1999年第8期。

3 李静杰、田军:《论定州系白石佛像》,《艺术史研究》第六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二者均藏河南博物院。

5 李静杰:《北朝后期法华经图像的演变》,《艺术学》第21期,艺术出版社,2004年。

6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附录第一》;塚本善隆:《龍門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佛教》,第三节《释迦·弥勒から阿弥陀へ 无量寿から阿弥陀へ——北魏から唐への変化——》,頁231—236,座右宝刊行会,1943年。

革命的背景关联,获得的发展程度仅次于阿弥陀佛。不仅如此,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中三者自由组合形式造像迅速发展,甚或此四者作为一个组合出现,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宋代¹。本稿所论述的三佛造像,也正是此背景下佛教信仰的产物。唐宋三佛造像继而成为元明时期三佛造像的源泉。至于第五种,纵向三世佛塑像,盖取材于佛教广泛流行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概念而来,缺乏与时代背景关联的信仰内涵。

北朝晚期至隋代,出现以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为主尊,左右侧配置弥勒佛、阿弥陀的三佛组合。如河南安阳小南海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中窟、安阳灵泉寺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大住圣窟²。卢舍那佛所以成为石窟主尊³,与当时以地论学为核心的华严经思想取得主导地位的背景关联,地论学的论师们所持有的弥勒净土信仰、阿弥陀净土信仰,应该是三者组合形成的主要原因⁴。这些早期实例,虽然与本稿所述宋代华严净土三佛组合没有直接联系,亦可看作后者的前身。

此外,前述广州光孝寺大宝六年(公元963年)西铁塔第二层,南面表现结跏趺坐施合掌印卢遮那佛(题记)。东面表现结跏趺坐施智拳印佛(题记模糊),应为金刚界大日如来,兼具法身毗卢遮那佛属性。北面表现结跏趺坐施触地印佛(题记模糊),应为释迦

成道造型。西面表现跏趺坐施对掌印佛(题记模糊),难以判断属性。南、东、北三面佛像构成华严经三身佛组合。这是已知较早的三身佛实例,而此法身毗卢遮那佛作佛陀造型,不同于本稿所述者作菩萨造型,两者的联系却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一度流行由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中三者组合形式的三佛造像,其中,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组合形式获得比较充分发展。唐代三佛实例多分布在四川,几乎为单独的摩崖龕像,宋代实例则陕北相对集中,几乎为石窟造像,且往往与十六(或十八)罗汉、骑狮文殊和乘象普贤、涅槃经变组合表现,唐宋三佛造像呈现发展的连续性。三佛造像源自北朝晚期、隋代滋长的净土信仰因素,在唐宋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组合形式,具备三佛属性的造像记多笼统地称作三世佛,即代表以净土为特点的三方世界的佛陀。三佛造像所以出现并流行,一方面风靡社会的净土信仰观念使然,另一方面贪图多种净土享受的意念,或者说多样的模糊的净土信仰意识使然。从而,三佛造像成为人们业已认知的西方净土经变、弥勒下生经变之外,反映唐宋时期净土信仰发展状况的重要图像。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责任编辑:杨丽丽)

1 在仅存的两宋时期地面寺院中,难以见到三佛或三世佛实例。文献中也不多见,温玉成先生找到辽、西夏的实例(温玉成:《泉州三世佛造像再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此外,宋范成大纂修、汪泰亨等增订:《吴郡志》卷三云:“广化寺在长洲县(今苏州市)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诸葛氏舍宅为之,名崇吴禅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赐今额,中更兵火夷为煨烬。都僧正清立以医药利施一方,所得费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萨,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1175),其徒复以余橐剂经楼。”《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页930、931,中华书局,1990年。此为南宋三世佛实例,但其具体内涵又不明确。

2 河南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又,河南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宝山灵泉寺》,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关于安阳小南海中窟主尊的属性,学界存在释迦佛与卢舍那佛两种意见。下述诸文主张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说。丁明夷:《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补正——析安阳三处石窟的造像题材》,《文物》1988年第4期;贺世哲:《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诸问题二》,《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颜娟英:《北齐禅观窟的图像考——从小南海石窟到响堂山石窟》,《东方学报》第70册,京都,1998年;李静杰:《北朝晚期与隋代的卢舍那佛像について》,《美学美術史研究論集》第19号,名古屋大学,2001年。

4 前引《北朝晚期与隋代的卢舍那佛像について》。